

相隔二百年時空

序《錢鍾書與約翰生》



燈下集 吳國欽

《錢鍾書與約翰生》一書的作者蔡田明君是一位旅澳學者，居澳三十多年，潛心學問與寫作。他是澳洲約翰生研究會會員，著有《走近約翰生》《約翰生評傳》，翻譯出版約翰生作品系列五種：《約翰生傳》《幸福谷》《人的局限性》等。

約翰生（一七〇九至一七八四）何許人也？約氏乃英國文豪，編寫《英文詞典》，編纂《莎士比亞戲劇集》，撰寫《詩人評傳》等宏大傳世著作，是英國文壇除莎士比亞之外影響巨大的作家之一。他把父輩的滄桑、家國的命運和對人類的悲憫，都融進作品裏。約氏其貌不揚卻錦心繡口，身軀高大卻文思敏捷，疾病纏身卻記憶超強，性格怪異卻最終成為文學巨子的人設。關於他的研究與傳說，在英國或世界從未間斷過。

錢鍾書（一九一〇至一九九八）是我國當代傑出學者與作家，被譽為「文化崑崙」，其學術巨著《管錐編》影響十分深遠。小說《圍城》出版後聲譽雀起，拍成電視劇後一時風頭無兩。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曾在家書中告誡兒子：「立身務正大，待人務忠厚。」錢鍾書將此作為座右銘加以篤行。

蔡田明君大學畢業後，曾分配到錢氏所在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中國文學研究年鑒》創刊和編輯工作，見過所裏錢氏並因好讀錢書而時有與錢氏通信聯繫；蔡君寫過《〈管錐編〉述說》的論著。即是說，蔡田明君對約氏或錢氏的生平傳略與作品，都有

深入了解，將他們兩人作比較敘說，實在是順理成章的事。

約氏與錢氏相隔二百年時空，錢氏讀過並多次引用約氏著作，他們兩人儘管所處時代迥異，社會環境不同，個人際遇也很有差別，但同為文學巨擘，同樣以如椽之筆書寫存世大著，其間的成功經驗與教訓，沾溉後人，啟迪來者。蔡田明君從約氏與錢氏出身的家庭環境、小學、中學、大學的學習與閱讀、步入社會後的不同際遇、家世譜牒，一一辨明。尤其是對兩人留下的作品進行深入研判比對，既從大處着眼，又重視細節展現，兩人的妙思雋語，時時流露於字裏行間。

約氏與錢氏都有獨立的人格，不隨波逐流，不逢迎諂媚，這是做人最可寶貴的性格。但在堅持自身立場觀點的同時，對社會環境也有一定的妥協。約氏政治立場鮮明，他反對美國獨立戰爭，直到晚年立場依然未變。憑着他對政客們的深刻了解，他本人並非國會議員，也從未參加過國會旁聽，僅憑想像虛構寫出了《國會辯論》，且寫得極其真切生動，繪聲繪色，讀者以為他親歷會議。錢氏對政治常常採取趨避態度。《圍城》大紅大紫之後，社會上一股頌讚之風撲面而來，錢氏卻保持定力。他認為，「門外的繁華不是自己的繁華。」他說，「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錢氏用他特有的睿智與幽默，禮貌地辭卻大批的造訪者。晚年，多家出版社要求出版《全集》，錢氏極力反對。

約氏與錢氏兩人都是博學鴻儒，著作量驚人。約氏編纂《英文詞典》，引文例句達十一萬六千餘條，涉及作家五百多位，其中以莎翁最多，共一萬七千五百餘句；錢氏《管錐編》引書更多，涉及中外作家四千人（中國作家二千七百人）。他留下的筆記、手稿據說有五大麻袋，幾達恆河沙數。商務印書館二〇一一年出版他的《中文筆記》二十卷，二〇一六年出版《外文筆記》四十九卷，洋洋大觀，窮搜博採，難有可比肩者。

無論約氏或錢氏，生前都受到一些批評或攻訐，這是很自然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正如約氏指出的，人都有局限性。但是，無論約氏或錢氏，堅守獨立的精神人格和學術良知，堅守對人類文化事業的終極關懷，這樣的文學巨匠、學術大家，是不應該苛求的。

行善、樂於助人是人最可寶貴的德行。約氏心地善良，功成名就之後，晚年的家幾成老弱病殘收容所；錢氏表面上看離群索居，有點不近人情。但他不想把光陰浪費在各種應酬中，許多朋友都說他是一位極端「惜光陰的學者」。但如有重要的事要做，他是不吝心力的。如修訂蔣天樞整理的陳寅恪詩稿和編年事跡，文學所選購海外圖書等工作，他積極參與。有中學老師（不是記者）求見，他爽快答應。這些都說明錢氏待人接物的優良品格。

由於蔡田明君對約氏與錢氏都有深入的研

究，成果卓著，因此寫來得心應手，材料豐富而翔實。約氏與錢氏作品車載斗量，頭緒紛繁，蔡君卻爬梳得當，條分縷析，引人入勝。約氏與錢氏同為牛津大學校友。約翰生說：「語言是民族的家譜。」錢鍾書說：文學要「能搖盪讀者之精神魂魄，且復能撫之使靜，安之使定者也。」既「靜」且「定」，這是錢氏為人為文之要旨。兩位文學巨匠都留下了極其豐富寶貴的文學遺產，彪炳史冊，足啟後昆向學之心。

我以前讀過中國學者寫的《關漢卿與莎士比亞》，將中西古典戲劇峰頂上的巨人作比較研究；也讀過《湯顯祖與莎士比亞》，把同一年（一六一六年）逝世的中西兩位大戲劇家作比較。今又讀蔡田明君的《錢鍾書與約翰生》，在蔡君筆下，約氏與錢氏被敘寫得生動真切，他們的個性與貢獻，都評判妥貼。從本書可以讀出人生之質感，嚼之英，咀之華。如寫到約翰生的父親擺賣圖書，約翰生少時可能因愛面子拒絕幫父親觀看書攤。晚年的約翰生一直為此感到愧疚，他回家鄉後特地到原來書攤位置站立，任憑風吹雨淋，任憑路人譏笑，以這樣的「怪異」的行動「贖回」自己的罪愆。這樣的細節，直擊讀者心扉，警頑起懦，很有人情味。

蔡田明君畢業於中山大學，是我的學生，我們交往幾達半個世紀。蔡君為人樸實、誠摯，訥於言而敏於行。看到學生豐碩的學術成果，我內心的欣喜不待言。

從擰毛巾開始



黛西札記 李夢

十年前，美國紀錄片導演大衛·賈柏拍攝的《壽司之神》（Jiro Dreams of Sushi）在日本上映，曾引起日本國內乃至世界各地熱愛美食的人們對於那間隱藏在東京銀座某寫字樓地下室的小小壽司店以及店中主廚小野二郎的十足好奇。十年過去，再度重溫此片，雖時移世易，片中對白仍發人省思。從壽司說開去，談到職人精神，談到父子承襲，談到人生起落，最終回到食物本身，可見世間萬千物事，因緣道理每每相通。

小野二郎出生在日本經濟低迷的昭和年代初期，曾親歷二戰，戰後立志成為壽司師傅，將製作極致口感的壽司當作畢生追求。先是在壽司名店與志乃擔任學徒，因天賦和勤奮，僅用了三年時間便站上壽司台。四十歲那年，他學成創業，在東京銀座開了一間名為「數寄屋橋次郎」的壽司店，自此開啟傳奇。獲眾多本地乃至海外政要名人到訪，獲日本政府頒發最高職人榮譽「現代名匠」，更連續十三年摘 downstream 三星。拍攝此片時，二郎更以八十五歲高齡，成為全世界最年長的米芝蓮三星主廚。

在日本，壽司曾經價格昂貴，

而在平價迴轉壽司店愈來愈多的當下，不少人誤以為壽司是製作簡單的「快餐」食物，殊不知，做出真正優質美味的手握壽司，需要一位壽司師傅畢生的艱苦努力。片中，小野二郎的學徒介紹說，站上壽司台前，起碼要用去十數年的準備功夫：先學會擰毛巾，毛巾燙手，訓練辛苦，但必須日復一日堅持練習；接下來是學習用各式刀具以及料理各種魚類；然後，到了第十年，才可以跟隨師傅學習煎蛋。千萬不要小瞧了煎蛋，片中這位學徒回憶說自己曾花費四個月、經歷了兩百多次失敗之後，才終於做出了一個合格品。獲得小野二郎「職人」的稱讚時，他高興得哭了起來。

每貫壽司長度七厘米、大約三百三十粒米（左右相差不超過四粒），米飯溫度維持在近似人體溫度的三十七度，章魚在製成食材之前需按摩四十分鐘以保證口感，廚房每日清洗三次以去除店內魚腥味……如是種種，都是小野二郎對於「職人」的嚴苛要求，也是「數寄屋橋次郎」聲譽日隆的保證。有美食評論家覺得品嚐小野二郎的壽司宛若欣賞一部協奏曲，由淺入深，由遠及近，漸入佳境。可見極致的美食與藝術並無二致，皆需日復一日的勤學苦練、執著不懈，最後，還有那說不清道不明的靈犀一點。

馬斯垂克的呼喚



域外漫筆 王非

新年一過，女兒就帶我到荷蘭旅遊。我們在阿姆斯特丹機場直接搭火車，到了燕豪芬。第一站是馬斯垂克，這是荷蘭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名字來源於拉丁文，意思是穿過馬斯河。從中央火車站出來步行大約二十分鐘，就看到了一個紅色教堂，這是女兒來馬斯垂克的目的之一。

這座教堂被稱為「牛血教堂」，天氣好時，教堂在陽光下的褚紅色格外醒目耀眼，透著一份怪異和奇特。我們抵達時是中午，濛濛細雨下，沒有陽光。教堂並不大，裏面充滿了哥德式藝術風格。沿著又窄又傾斜的樓梯小心翼翼地拾級而上，很快見到一個小展覽廳，它在每個季節或時段都有不同展覽主題，當天的主題是馬斯垂克的市景油畫，一幅幅風景畫美輪美奐。徐徐登上教堂頂層，靜靜眺望馬斯垂克市的全貌，它的古樸和美麗令人心馳神往。牛血教堂旁邊則是著名的聖瑟

法斯聖殿和被譽為最美書局的「多米尼加書局」，參觀書局並且一定要買幾本書是女兒的目的之二。它本是一座哥德式教堂，建立於十三世紀，後來被一位荷蘭設計師重新設計，在不破壞教堂結構的情況下，搭設無數鐵架，空間寬敞，採光通透。最富時代感的設計是書局的門，它被設計成書本的形狀，開店時打開那本書，關店時則將書本合上，過去與現在無縫交融，身處其中，感受震撼。細心留意一下會發現，在書局一角還保留了一幅壁畫，顏色斑駁，卻肅穆神聖。女兒興致勃勃地買了厚厚一疊書，抱在胸前，神情滿足，彷彿突然之間身體裏面裝滿了知識和力量。

最後，她帶我來到一個面積很大的咖啡廳，咖啡廳的座位區原本是教堂的祭壇，半圓形的空間搭配中央十字型的餐桌，配上牆壁古老的雕刻和畫作，氛圍神秘，藝術氣息濃厚。咖啡的熱氣在挑高的天花板間裊裊升騰，香氣則在巨大的玻璃窗前纏綿不去，神聖莊嚴的氛圍環繞四周。啜一口咖啡，品味一下歷史，彷彿聆聽著馬斯垂克默默的呼喚。

局外人



英倫漫話 江恆

早前內地新上映的德國電影《誰偷了我的粉兔子》，講述了猶太女孩安娜為逃避納粹迫害而漂泊異鄉，戲裏的情節感人至深，而戲外的故事同樣令人唏噓。影片改編自英國女作家朱迪斯·克爾的同名自傳小說，她出生於戰前德國的一個猶太知識分子家庭，片中的流亡經歷正是她一家人的遭遇。與電影採用悲傷中帶著溫情的表現手法不同，現實中的一切無比殘酷，九歲的克爾跟隨父母顛沛流離，路上經常食不果腹，還要時刻提心吊膽，最終輾轉了五個國家才落腳英國。用克爾在書中的話說，「沒有人會因為好玩而流亡他鄉，人們深愛自己童年待過的地方，那裏的人，那裏的語言。」而她之所以飽經磨難，皆因她是一個猶太人。

實際上克爾在英國落腳後，社會氣氛未有本質改善。當時納粹思潮在英國盛行，不僅有很多納粹黨人的信徒，就連王室都與納粹有著扯不清的關係，像「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愛德華八世，就被指控充當納粹德國的間諜。英國許多貴族和社會名流更與納粹關係密切，美國耶魯大學學者勞倫·楊在《希特勒女孩：二戰前夕的英國貴族和第三帝國》一書中，就講述了年輕貴族尤妮蒂的真實個案，她本人迷戀希特勒，是一名激烈的反猶太主義者。為了見到希特勒，她還入讀了德國南部的一所精修學校，她後來得以和希特勒見面一百六十多次，湧動於英國上流階層的親納粹狂熱可見一斑。

甚至連英國政府對猶太人也缺乏同情。猶太作家丹尼爾·戈迪斯在《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一書中直指，二戰期間英國負責託管巴勒斯坦，但在戰爭最初的十九個月中，沒有批准一名猶太移民進入該地區。不僅如此，英國為防止猶太移民滲入，還專門建立了拘留營，和納粹德國一樣將抓住的猶太人，統統關進有鐵絲網的營地。據說戰時首相邱吉爾亦對猶太民族沒什麼好感，劍



▲猶太作家丹尼爾·戈迪斯著《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

橋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德·托伊曾在學校檔案館中，發現一篇他寫於一九三七年的文章《猶太人如何才能抗擊迫害》，他在闡述席捲歐洲的反猶浪潮時聲稱，「或許他們（猶太人）也應該為自身所遭遇的災難負部分責任」。這也就不難理解，邱吉爾為何一度登上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暗殺名單。

正如英國學者卡爾德·沃爾頓在《帝國內幕：英國情報機構、冷戰和帝國的黃昏》一書中所說，老牌帝國與猶太民族的關係並不和諧，想知道英國人緣何對猶太人反感，要從歷史中尋找答案。早在十一世紀歐洲「征服者」威廉入侵英國，猶太人便隨之而來，基於宗教等複雜因素，猶太人多以放高利貸為生，加上後來歐洲十字軍東征運動等政治迫害，英國人對他們的偏見和敵視與日俱增。比如理查一世時期，倫敦的猶太社區遭到大洗劫，許多普通猶太人被屠殺；到了愛德華一世時代，他又對猶太人下達「逐客令」，所有猶太人必須限時離開英國，否則將被處死。甚至直到十九世紀，英國各階級也常將猶太人視作異教徒，並未給予他們相應的公民地位。

英國這種瀰漫的反猶情緒，也在文學作品中有所記載並可一窺端倪。像莎士比亞筆下《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便是貪婪的猶太奸商；狄更斯《霧都孤兒》中的大反派和邪惡象徵的教唆犯斐金，也是陰險毒辣的猶太人。甚至以童書《查理和巧克力工廠》聞名的達爾，也聲稱「希特勒不是無緣無故找猶太人麻煩」。如同英國學者西塞爾·羅斯所形容，對猶太人的偏見根深蒂固，注定了他們在英國只是被利用，「似乎就是一塊吸滿了王國流動資本的海綿，每當國庫虛時，就要去擠這塊海綿」，根本擺脫不了被歧視的命運。

值得一提的是，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猶太裔的本傑明·迪斯雷利破天荒地擔任了英國首相，但背後付出的代價卻鮮被提及，他不僅為此改變宗教信仰成了基督徒，更去掉了猶太姓氏，在他剛從政時因猶太人多從事舊衣買賣而被人蔑稱為「舊衣服」，即便他成為首相後，外界仍質疑他是否對英國足夠忠誠。事實上，直到將近二十世紀，猶太男性才獲得與其他英國白人男性完全一致的政治權利。

進入二十一世紀，英國社會日益政治化，猶太人的處境變得更為複雜。二〇一六年發生了著名的倫敦市長選舉風波，有工黨女議員因不滿以色列的中東政策而被批反猶，工黨前倫敦市長利文斯通站出來為其辯護，指「以色列人在批評納粹的同時，他們也在對巴勒斯坦人做同樣殘忍的事。以色列游說團體長久以來精心布局，令如今只要有任何人批評以色列政策就被視為反猶太人。」豈料他這番話遭到不同政治立場人士的集體圍攻，以至於有評論指，他們並不關心反猶本身，更像是把它當作選戰工具。另外，在英國脫歐期間，有極端民粹主義分子公然佩戴納粹時代侮辱猶太人的「大衛星」標誌。

直到今天「反猶」仍是英國社會的高頻詞，有社會學者就認為，猶太人的遭遇是冰山一角，顯示英國社會遠不如宣稱的那樣多元和包容，猶太人和許多其他少數族裔一樣，儘管努力融入當地，卻始終有如局外人。

交織的軌跡



市井萬象

「交織的軌跡：德國現代設計1945-1990」特展現現於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行，展出三百餘組戰後德國設計作品，包含平面、傢具、照明、室內設計等諸多門類。展覽由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與德國維特拉設計博物館、德累斯頓國家藝術收藏館聯合主辦。

新華社

